

“楼兰考古研究，该听听中国的声音了”

孟宪实

我不止一次亲耳聆听侯灿先生申明楼兰考古的重要性。新疆考古对于中国十分重要，而楼兰是国际瞩目的焦点。斯文赫定、斯坦因一言九鼎的时代过去了，楼兰考古研究，该听听中国的声音了。这是侯灿先生无数次强调的主旨，作为新疆的第一部考古报告的撰写者，侯灿先生满怀自信。

侯灿先生主笔的楼兰考古报告《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终于迎来了出版的时刻。

1980年，新中国唯一的一次楼兰考古工作，是由侯灿先生担任领队的，而1987年，经过几年的埋头整理研究，《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完成，并寄给北京著名的专业出版社。三十多年过去了，楼兰依旧传说纷纭，有关列强的楼兰掠夺，依然能够激起国民的爱国激情，但是作为中国楼兰考古重要成果的这部考古报告，却一直昏睡在侯灿先生的书籍中。

1987年，侯灿先生的工作单位从新疆考古所转为新疆师范大学。作为历史系的同事，侯灿先生引领我走上吐鲁番的研究道路，我因为有随时请教的良机，对侯灿先生的故事也自然多所了解。

1987年11月9日，出版社给新疆考古研究所的信件是这样说的：“侯灿同志编著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早收到。报告纠正了前人的一些失误，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新资料和论证，有助于学界清楚地认识楼兰的历史。我们已经列入明年的发稿计划。谢谢作者和贵所的鼎力支持。”得知报告已经列入明年计划，侯灿先生的愉快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我不止一次亲耳聆听侯灿先生申明楼兰考古的重要性。新疆考古对于中国十分重要，而楼兰是国际瞩目的焦点。斯文赫定、斯坦因一言九鼎的时代过去了，楼兰考古研究，该听听中国的声音了。这是侯灿先生无数次强调的主旨，作为新疆的第一部考古报告的撰写者，侯灿先生满怀自信。我为侯灿先生高兴，也为中国高兴。

侯灿先生的好心情只维持了几个月。转年3月28日，出版社给侯灿先生再次发来信件，内容是：“据了解，《文

物》月刊将在今年七期发表楼兰调查发掘的一组简报，简报包括了现有这本《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主要内容。我社目前纸张紧缺，出版方面有很多困难，鉴于上述情况，原拟出版的楼兰报告专刊实无法承担。因此只有将报告原稿暨还（另函），请查收并恳祈多多见谅。今后楼兰如发现新的重要收获，我们还可重新研究出专刊。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

退稿信明确无误。如果一开始就拒绝，情形会好些。先宣布列入明年计划，再宣布退稿，变化太剧烈，打击程度自然更高。要撰写这样的退稿信，也需要煞费苦心。《文物》月刊第七期，发刊日期是7月29日，三篇文章分别是《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和《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因为排在刊物的第一组，十分醒目。考古工作先发表简报，再发表报告，这是考古行业的惯例。经常遭遇抱怨的是考古简报发表后，考古报告却一拖几十年都没有动静。侯灿先生的工作如此迅速，简报和报告几乎同时完成，完全可以看作是考古学界的奇迹了。但是，却因此遭拒绝，未免过于残酷。

从此，侯先生到处奔波，不断写信，争取楼兰考古报告的出版，争取申请课题获得出版资助。当然，最后的结果都一样，考古报告进入睡眠模式。1990年7月11日的《新疆日报》第四版，有《难出书、出书难》的文章，还专门举出侯灿先生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为例进行说明。

事实上，关于楼兰考古，侯灿先生一直在挣扎努力。付出的心血太多，忘记并不容易。1994年我到北京读书，跟侯灿先生的联系主要以书信为主。知道侯先生放不下楼兰，我曾建议，可否像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那样，用比较通俗的形式公布考古资料，总比没有声响

好。侯先生觉得可行，这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楼兰的发现》书稿计划的因缘。在北京读书期间，我跟朱玉麒联系很多。玉麒兄博士后出站之后，继续回新疆师大工作，不仅主编《西域文史》学术杂志，还主持了该校的西域文史学科建设。他知道侯灿先生有楼兰考古的第一手资料，于是积极联系侯先生，双方敲定《楼兰研究与探查》项目，新疆师大出经费，侯灿先生着手研究。当时，侯先生已经退休，先定居成都，再转移上海，与玉麒兄定的计划是2004年底，转年即投入工作。侯灿先生1936年出生，至此，已经年近七十，而两年前刚刚完成心脏搭桥手术，却并不满足于含饴弄孙的退休生活，遥远的楼兰，依然是心魂的牵挂。

现在看来，楼兰，注定要成为侯灿先生永久的遗憾。他有力量的时候，社会环境不能给予机会。如今，新疆师大将机会送上门，侯灿先生却无力把握了。他已年老体衰，病魔缠身。我得到的消息有限，但总是侯先生的病事又有增加这类不祥的信息。虽然如此，侯灿先生依然在进行最后的努力。2012年，当侯灿先生把论文书稿《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寄给我的时候，我其实无法了解，在论文集和楼兰考古研究之间，事实上侯先生已经进行了选择，楼兰研究实在无力完成了。

2016年6月20日，侯灿先生永远地离开了，他再也不用为楼兰心碎了。

我深深知道，楼兰考古报告是侯灿先生最大的牵挂，如果有机会出版，至少能够安慰一下侯先生的在天之灵。我认真地询问新疆考古研究所的于志勇所长，侯灿先生已然不在，能否安排出版他的生前作品？于所长斩钉截铁地说，毫无问题，全部由考古所出资。我把电话打到上海，得到的消息几乎就是噩耗——或许正处在伤痛时期，侯灿先生



“三间房”西南的民居建筑，远处的“三间房”是楼兰的象征

夫人吴美琳老师很肯定地说，没有这样一部书稿。我不仅惊愕，而且产生一个可怕的想象：会不会是侯灿先生过于伤心，一气之下毁掉了书稿？我呆坐在椅上，几乎忘记挂断电话。

2019年6月18日，在侯灿先生去世三周年的前夕，我认真地写下《怀念侯灿先生》一文，先是发表在上海《文汇报》（2019年9月20日“文汇学人”），后来被编辑作为序言收入侯灿先生《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一书。当时的想法很清楚，一定要把侯灿先生《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故事记录下来。该书出版后，吴美琳老师惊醒了，她在全家各处进行了全面搜查，终于在一个密封完好的牛皮口袋里，找到了整整齐齐的文字和图片原稿。

吴老师的电话，让我兴奋了好几天。朱玉麒教授的兴奋比我更甚，立刻决定由新疆师大黄文弼中心从刊出版。2019年12月17日，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我们乘车前往上海，郑重接受了侯灿先生的遗稿《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

我们看到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是手写稿，注明时间是1987年3月。文字是吴美琳老师工整抄录的手笔，有侯灿先生的加改。应该是稿子从出版社退回后的修改，多是汉文，也有英文，加注斯坦因等篇目。无

法想象，一边是出版无望，一边是不断的修改，面对这样的书稿，侯灿先生是怎样的心绪？目录之后是缘起，仔细记录了考古工作队的分工，最后写到“材料的汇集和报告编写是侯灿同志整理并执笔的”。费尽侯灿先生心血的这部报告，原来是一个集体工作成果。在报告撰写的时候，已经有考古队队员去世，侯先生不忘一一注明。如今，侯灿先生也是故人了，撰写报告的时候，他一定会想着要对得起逝去的同事，不能让他们丧失历史记录，谁知道最终连侯灿先生本人也无缘看到这部报告的出版。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是一部迟到三十多年的考古报告，原计划应于1988年出版。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楼兰故城，已经成为很多人自驾游的目的地，楼兰学术考察的节目，也经常见诸电视。但楼兰考古，在1980年之后，再也没有进行过。斯文赫定、斯坦因之后，由中国学者主持的属于科学意义的楼兰考古，这依然是唯一的一次。侯灿先生主笔的这部报告，依然是最新的楼兰考古报告。

原本，应该由著作人完成后记，但这部报告经历坎坷，最后只能由我这个旁观者书写文字代替后记。请读者了解原委，理解学术之不易。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出版，最终由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资

助，并列入“黄文弼中心丛刊”，似乎也是一个轮回之后的命定，具有着双重的里程碑意义：一方面，《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由侯灿先生晚年执教的单位负责出版，无疑是新疆师范大学这个与改革开放同龄的年轻高校在西域文史学科引领学术、建立传统的里程碑。更为重要的是，1930年代两次深入罗布泊地区的黄文弼先生，是出现在这一荒漠中从事考古工作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他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也是关于这一地区为世界所瞩目的第一份考古报告。虽然他主要从事了罗布泊北岸以土壤为主的汉代遗址考古，而没有进入楼兰；如今，《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出版，正是中国学者沿着黄文弼的罗布泊之路而进入楼兰遗址核心区考古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文匯學人

第492期

地名中的通名一般指代某一类地理实体的类型（如“虹口港”的“港”），它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地理密不可分，有着极具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地名的历史层次和文化的历史层次往往能够互相印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笔者主要以上海地区的村落通名为考察对象，以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村名图层的数据为依据（共收录21世纪初全国390余万个以自然村为主的农村地名，其中上海地区涵盖1.4万多个地名）展开分析和论述。此数据并不完整，也不完全准确，但大致可反映上海和全国地名通名的分布情况。

上海排名前12位的村落通名（及其占比）分别是宅（22.73%）、村（17.62%）、桥（6.98%）、浜（6.98%）、塘（4.51%）、泾（3.72%）、港/江（3.38%）、埭（3.29%）、湾/弯（2.24%）、里（2.15%）、圩/于（2.06%）和舍/厍/沙（1.83%）。“村”作为一个在全国普遍使用的村落通名，在上海的高占比和近几十年来较大范围的自然村改并行政村相关，新设的行政村多遵循“某某村”的命名模式。多数村落通名前都冠以姓氏，最普遍的模式是“姓氏+家+通名”。上海地区所有地名中带“家”的占比高达46%，排名前12位的姓氏分别为王、张、杨、陈、陆、朱、金、沈、徐、周、李、顾。由于“王”的吴语白读音与“杨”相近，杨姓比例很可能是一些地方把“王”写作“杨”。排名前12位的村落通名中，8个与水相关，是上海水乡地貌在地名上的反映。许多河流名是叠用的，如沈泾塘、漕河泾港。不少村落通名也会叠用，如李厍里，有时叠用的通名还可能不是同一类地理实体，如金埭港、西吴巷泾。下文选取几个有吴地代表性的通名分作阐释。

【宅】“宅”是极具上海特色的村落通名，全国带“宅”的村落四成在上海。“宅”在当地所有地名中的占比，以地市为单位，上海最高，为22.7%，第二名的苏州仅为5.3%；以区县为单位，排名前五的区县都在上海，其中浦东和宝山占比均高达45%左右，“宅”的强势程度可见一斑。

【浜】直到宋代，文献中才出现带“浜”的地名。《广韵》称“浜”为“安船沟”，《集韵》则说“沟纳舟者曰浜”。方言中“浜”又被称作“浜兜”，“俗呼港之不通者曰浜兜”（民国《嘉定县志》），指只通一头的小河道。直到近代，太湖平原地区百姓出行的交通工具

上海特色地名 蕴含怎样的历史文化信息

陆新蕾



上海青浦朱家角大清邮局门头

主要是船，“浜”类似今天上海居民区的“死弄堂”，一头深入村落供村民停船，另一头连通“浦”“塘”等大河。南宋《吴郡志》中就有关于百姓大量破坏塘浦堤岸“擅开私浜”的记载。全国带“浜”的地名，嘉兴市占比48.1%，苏州市占比28%，上海市占比15.8%，再加上排名第四的潮州市和第五的无锡市，环太湖区域带“浜”的地名占比全国超过97%，最密集的嘉善县超过37%的村落名带“浜”。因此，“浜”是一个有着浓厚太湖地区特色的通名。松江区15.6%的村落名带“浜”字，是上海含“浜”量最高的地区。

【塘/浦】“塘”即“隄也”（《说文解字》），本指堤岸，至今北吴地区民间仍称河堤为“塘岸”。“塘”也被引申为筑有堤岸的河道。池塘一般用“荡”而非“塘”。汉代的《越绝书》记载了吴地关于“塘”的来历：“句践已灭吴，使吴人筑吴塘，东西千步，名辟

首。后因以为名曰塘。”“塘”是南方非常普遍的村落通名，上海4.5%的含“塘”量只能排到全国地市的第49位。闵行区是上海含“塘”量（12.4%）最高的地区。

“浦”最早见于先秦时代的文献。“浦”在吴地往往指南北向可通吴淞江的大河，浦与浦之间则开凿“塘”以连通彼此。最迟到宋代，太湖平原已形成了“横塘纵浦”的水系格局；“古人之法，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士以为隄岸，使塘浦阔深而隄岸厚。”（《吴郡志》）因此，塘、浦一般是太湖流域仅次于“江”的第二层次的大河。“浦”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福建、广东、上海等地，青浦区（1.1%）是上海含“浦”量最高的地区。

“横塘纵浦”的命名规则在南宋之后渐被摒弃，许多新开或疏浚的河道都称“塘”，“浦”的数量急剧减少。如宋代庆历年间所开顾会浦，是沟通松江府

城和吴淞江的重要河道，南宋时河道南段已改称通波塘，一直延续至今。今天上海村落通名中“浦”的占比不到0.6%，仅为“塘”的13%，而北宋郑重《吴门水利书》中记载的大河，“浦”占据六成以上的绝对多数。

【泾】泾在吴地一般指人工开凿的次要河流。《说文解字》把“泾”解释为渭河的支流“泾水”，但成书在汉代之前的《管子》提到“泾水十二空，汶、湘、洙洹浦”“疏三江，凿五湖，道四泾之水”，显然已将“泾”作为了一般河流的通名。《尔雅》曰“大波为渊，小波为沦，直波为径”。《释名》则言“水直波曰泾，泾，径也，言如道径也”。可见，“泾”作为河流通名可以追溯到两汉甚至更早。据顾国林统计，北宋郑重记载的吴地河流，泾占26%，明代《吴中水利全书》记载的1万余条河流，泾又占比1/4。可见从宋代到明清，“泾”作为吴地强势河流通名的地

学林

位一直很稳定。一般“泾”前多冠以“官”“横”以及表示数字、方位的字。现今全国带“泾”的地名主要集中在苏州（54.5%）、上海（25.1%）、嘉兴（9.9%）、无锡（3.9%）四市，合计占比超过93%。青浦区11%的村落名带“泾”字，是上海含“泾”量最高的地区。

【港/江】由于“港”和“江”两字在吴语中音同而调不同，大量实为“港”的地名被书面记录为“江”，因而合并统计。

“港”是北部吴语区常用来指称河流的通名，相当于普通话的“河”，河流不论长短宽窄曲直，都可称之为“港”。港口（原指河道的分叉口）是后起的现代意义。“港”在古代文献中也多指河流，最早的记载至少可以追溯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东北流为长洋港……港水东南流注于江。”

“江”在太湖东部地区的使用非常有限，长江之外，只有吴淞江、娄江（或许还有很早就淤没的东江）等极少数几条大河才有资格称“江”。随着宋代以后吴淞江的逐渐淤积以及明代之后黄浦水系的不断疏浚，太湖以东最大的河流由吴淞江变为黄浦，于是明代开始，“黄浦”逐渐被称为“黄浦江”以突显其水势之大，而吴淞江下游段在上海开埠后则被称为“苏州河”。

苏州、嘉兴、南通、盐城和上海的含“港”量排名全国前五。崇明区6.5%的村落名带“港”字，是上海含“港”量最高的地区。

【埭】“埭”指“以土壅水”（《广韵》），“壅水也”（《集韵》），同“堰”“坝”，即挡水坝，最早见于东晋的文献中。吴方言多将“跑一趟”说成“跑一[da]”，本字就是“埭”。作为地名的“埭”在太湖流域有两种读音，苏州西部和无锡读[de]（与韵书相合），苏州东部、上海、嘉兴等地读[da]。根据蔡侯的研究（《地名通名中的同名异义与同义异名》），“埭”字在吴地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字典里的本意，即拦河筑坝，如苏州相城的黄埭、无锡的葛埭；二是河道两侧的土堤；两岸居民为避水患又多在堤坝上建村舍，于是“埭”又有第三种含义——村落。这种村落沿着“埭”一字排开成长条形，因此吴语中把“一排”说成“一埭”即为此引申义。嘉兴（27.2%）、上海（18.2%）、镇江（12.6%）、苏州（9.2%）和湖州（7.4%）五市是含“埭”地名最多的地区，合计占比全国的74.6%。金山区（10.8%）是上海含“埭”量最高的地区。

【厍/舍/沙】“舍”原意指茅棚，引

申为村庄。“厍”是“舍”的俗字，主要在沪苏嘉三地使用，有时“厍”也会写成“沙”，如“顾家沙”，两字在方言中同音不同调。全国带“厍”字的地名，上海（52.6%）、苏州（30.3%）和嘉兴（10.3%）三市占比合计超过总数的93%，是一个极具太湖东部特色的吴地地名。松江区3.2%的村落名带“厍”，是整个上海含“厍”量最高的地区。

* * *

把排名第一的“宅”和第四的“浜”作一比较，会发现一些有趣现象。在太湖流域东部，“宅”主要分布在沿江沿海地区，“浜”则密集分布在嘉兴境内以及苏州大部分地区和上海西南的松江、金山、青浦三地，“宅”和“浜”的主要重叠区域又与古海岸线“冈身”较为一致。如此规律性的分布绝非巧合，放眼整个江南，丘陵地带表示山间平地的通名有忝、塶、冲、芥、埕五种，彼此的分布也十分规律。以上两种情况或许暗示了古代江南平原和丘陵地区不同民系的分布。此外，就姓氏与通名的关系而言，“姚”这一在所有上海带姓氏的地名中排第19位的姓，在以“浜”为通名的地名中排名竟上升到第4位，这似乎暗示了“姚”姓与“浜”的渊源。上述线索是否可视作江南历史上居民成分和文化类型演变在地名上留下的印迹？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总体而言，由于各区域自然条件、历史发展轨迹甚至居民成分的不同，上海地区的通名分布，冈身以东的滨海平原与以西的湖沼平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上海还有许多特色地名，如冈行的“行”本为“巷”，嘉定、普陀地区的“槎”（木筏），南汇、奉贤地区的“泖”（潮水在滩涂、冲刷出的河道），松江地区的“泖”（类似潮荡的河流宽阔段），指代小河的“溇/楼”，和盐业生产相关的“冈/岗”，奉贤沿海开发时分股（古）围垦滩涂的“古”，以及还未探明其义的“奴”。“墩”在冈身以西多为上古的墩居村落，而从金山经南汇嘴至吴淞的沿海地区的“墩”则本为烽火台。限于篇幅，以上种种不赘。

特色地名是传承上海历史脉络的重要载体，通过保护和利用，这些传统的地名将成为打造上海文化品牌的宝贵资源。（感谢顾国林先生对本文的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